

为民请命

梁守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为民请命

梁守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民请命/梁守德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8

(中华时代骄子/李占军主编.第5辑)

ISBN 978-7-5059-7635-1

I. ①为… II. ①梁… III. 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428 号

书 名	为民请命
主 编	李占军
作 者	梁守德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社 址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印 刷	廊坊市金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3 (总 90)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635-1
总 定 价	180.00 元
定 价	11.25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为民请命（报告文学）	1
第一章 凌城惊梦：在政治昏热病中觉醒	3
第二章 走进苏鲁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13
第三章 千里赴京：犯颜直谏中南海	27
第四章 慷慨悲歌：七百份意见书发出后	38
第五章 10年+8年：牢狱之灾与谁诉说	55
第六章 冤情难忘：共和国灾难不再重演	82
尾 声 秦淮河：南京的非主流风景	95
【附录】	
两位与中国农民共命运的知识份子/陈大斌	99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	113

为民请命

梁守德 著

在南京，有这么两个人——他们年龄相当，人都很瘦，且都有一个年龄相差较大的妻子和一个类似于孙女的漂亮的大学生女儿，他们曾是“劳改犯”，但都有一个不顾生死而“为民请命”的宽大胸怀。这就是被中央党校教授称之为“最早为包产到户奔走呼号的两个年轻人”——钮惟新、蔡扶民。

1958年中国“大跃进”让人刻骨铭心，“三年自然灾害”让六亿农民啼饥号寒，那种山河泣血、民生涂炭的情景令人难忘。

据统计，当时患有野菜中毒、痢疾、小儿疳积、严重发育不良、妇女子宫下垂、绝经、紫甘、浮肿、干瘦等病的人，在3亿3000万人次以上。上海大学学者金辉早在1993年《社会》杂志上撰文，明确提出“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4060万人。而2005年9月，国家民政局、保密局共同宣布对建国以来历次自然灾害情况数据解密，三年饿死总数在3000万以上，已被《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列为世界“饥荒之最”，而仅这个数字也是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死亡总数的100倍。

这一惊人的数字令人类良知受难，令世界历史蒙羞！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大“自然灾害”，这一灾难几乎葬送了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然而这是自然灾害吗？当然不是！1962年1月，总结“大跃进”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明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场灾难，要用

石碑刻下来，教育后人。”

现年七十有余、当时只有二十岁左右的钮惟新、蔡扶民，一边与年轻的共和国一道咀嚼着难以下咽的政治苦果，走过艰难的岁月，一边冒死上书，为民请命，直至身陷囹圄。——这一英雄壮举全体中国人民同样不能忘记。

第一章 凌城惊梦：在政治昏热病中觉醒

一

南京不仅是六朝古都，还是一座悲情城市。游览过总统府、中山陵、大屠杀纪念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梅园新村等等，不免感到一种革命领袖归来、仁人志士蒙难、无辜生灵遭受涂炭的悲壮。

2011年6月25日，我从青岛到南京，飞机一落禄口机场即遭暴雨袭击，让人抬不起头，睁不开眼。“南京真是一座令人跪拜的城市，还没进城就不得不低头迎接大雨的洗礼……”我对前来接机的钮惟恭先生感慨。

钮惟恭只笑不答。他1935年生，76岁，人虽瘦，却高大魁梧。报界传说一个年龄最大的老人在上海主办了一份时尚的报纸——《时尚饰品报》。他本来是媒体从业者，一直在地质矿产部门从事宣传工作，曾效力于《中国地质报》《中国国土资源报》，后退休办报。我跟他在义乌相识，约定写他四弟钮惟新和钮惟新的同事蔡扶民的故事。因他在家排行老三，在我们当中年龄最大，所以我等皆称其为“三哥”。

“三哥”钮惟恭说，我是他的一位重要朋友，不但提前一天从上海赶到南京，还亲到机场接我。我感激他，更为他对那段历史、那两个历史人物的强烈关注而备受感动。

根据三哥钮惟恭安排，我们由机场直去浦口区江浦二中宿舍，找他四弟钮惟新，但因他常驻上海，并不是很熟悉南京，

加上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看不清城市面貌，即使进入江浦街道仍辨不清方位，不得不打电话随时联系。

前面路边一个瘦瘦的老人打着雨伞在走，钮先生下车问路，却不想接着哈哈大笑了，原来他问的那人正是我们要找的蔡扶民。——他是冒雨从鼓楼区赶来钮惟新家聚齐的。

好像南京没有胖人。上车后，我发现 1937 年出生，74 岁的蔡扶民也很瘦，浑身干瘪，不像能干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到了江浦二中宿舍，见到打着雨伞在楼下等候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钮惟新，更瘦，73 岁的他两眼凹陷，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显得颧骨鼓出，身体比蔡扶民还弱。——这就是我要找的两位英雄？

我们在钮惟新家见到了他的妻子，还有他近似孙女的大学生女儿。这样，“三哥”钮惟恭策划要找的人物到齐。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进入那个狂热的年代，听到了那些悲情故事。

二

1957 年 8 月，18 岁的钮惟新南京一中毕业，考入江苏省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全家人为之高兴，正当母亲为他购置新书包时，他却变卦了。“我不去师专报到了。我想当一名新闻记者，复习一年，再考新闻系。”

这样一个有志青年，家人自然很高兴，但复习期间情况有变，中共江苏省委当年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普及农民文化教育，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当时的口号极具感染力：“为了消灭城乡差别，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多么宏大的人生目标啊！一个共青团员决不置身于大潮之外。接着他对家人宣布：“我决定放弃考大学，下乡安家落户，普及农村教育。”

那个时代容易改变人，也容易让年轻人产生激情与冲动。

对他的这个决定，家人没有反对，因为其口气不容置疑，其表情义无反顾，就让他像长江急流中的一条小船，随时代大潮飘去吧。

1958年4月的一天上午，南京下关浦口码头锣鼓喧天，红旗飘舞，党政领导和南京市民上千人齐聚长江边，热烈欢送500名高中毕业生奔赴农村。19岁的钮惟新人生目标由此改变。他毅然放弃当一名新闻记者的理想，背着书包和行李，跟这一批稚嫩的黄口小儿一道，从六朝古都水运到徐州，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农村第一线——离南京100公里以外的苏北睢宁县凌南乡，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不久全国兴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睢宁县把离城18公里的凌城、凌南两个乡合并成一个凌城公社，公社南与安徽泗县接壤，东与宿迁市相邻，是苏皖两省三市四县九个乡镇的接合部，有“一步跨两省、鸡鸣闻四县”的说法。两乡合并后腾出的土地拨给学校，由南京来的“小老师”新建一个凌城公社农业中学，让他们一边教学，一边耕种100多亩土地，让这些农家子弟学习文化的同时，学会深翻土地与合理密植。中学校长叫陆会明，由附近一个叫桂庄的大队书记兼任，实际工作由钮惟新他们主持运转。一个院子圈两排平房，十多间屋子，十几个教职员，四百多学生的农业中学宣告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钮惟新与蔡扶民在此相遇了。他们俩教一个班，钮惟新教语文，当班主任，蔡扶民教数学。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一个要“惟新”，一个要“扶民”，南京来了500多人怎么这么巧？为什么偏偏他们俩分到了一起？两人身体偏瘦，性格迥异，钮惟新少语，内向，善于思考；而蔡扶民勤奋，活跃，细致，有强大的执行力。两人性格上互为补充。

三哥钮惟恭说：“如果不是他们两人相聚，何以走得那么

远？两人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番样子。”

令人感慨的是，他们走到了一起，互相依偎着大踏步前进了。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凌城农中一跃成为睢宁县一等先进农业中学，钮惟新拿到了盖有县长大印的“凌城农中教导主任”的任命书，还兼团支部书记，负责凌城农中的教学业务。蔡扶民则被评为省级模范教师，成为江苏省教育厅对外参观交流的典型。那一年，两人同时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决心把青春和热血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钮惟新、蔡扶民两个年轻的生命烈焰红通通地燃烧起来，不假思索地、迅速地陷于那场不可阻挡的政治狂热中。

“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好，有创新！”钮惟新说，“1958年8月27号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报道了天津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还有一个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说毛主席亲自视察过……”

口号是多么劲爆！事情是多么可笑！时至今日，世界上水稻单产最高的澳大利亚亩产是660公斤，而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经过48年的科技攻关，到2011年9月水稻亩产才达到926公斤。一万斤！你把一万斤粮食堆在一亩地上能放得下吗？一万斤，你把袁隆平再克隆十个能办得到吗？但当时全民集体“头脑发热”，觉得是多么鼓舞人心啊！

接着大好的消息接踵而来：有的南瓜每个100斤，高粱每亩25000斤，甘薯每亩100万斤……种地的好像不是人，而是

种啊……有的地方养出 4000 斤一头的猪，那不是猪，那是传说中的恐龙啊！

“我国占世界 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 22%的人口，照这样下去我们可以养活整个太阳系！”钮惟新热血沸腾了。

“大炼钢铁成果辉煌。”蔡扶民说，“城市钢铁厂不说，乡村遍地开花，土高炉从 3 万座发展到几百万座，从几千万上阵，到一亿人上阵……”

有一天，收音机忽地传来北戴河会议召开的消息，会议向全国人民预告：“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是啊。”钮惟新越来越兴奋了。“人家山东一个县，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新乐园，听他们编的歌谣：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两人备受鼓舞，热血沸腾，每个毛孔里都充满了激情。钮惟新摘下眼镜，迈着四方步，一边在农中办公室狭小的空间来回回地走，一边感叹：“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然后模仿着毛主席讲话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人们，15 年苏联可能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说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超过英国。”

蔡扶民则低声吟诗一首：“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声音虽低，气魄不凡。

于是两人在课堂，在村头田间，向学生和农民群众积极宣讲“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蔡扶民讲课，对学生大发感慨：“看啊，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我们的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相信吧，我们要把珠穆朗玛铲平，我们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

劳动人民本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表达了它的尊严……”

钮惟新提出：“我们要一边深翻土地，一边写诗，大张旗鼓地宣传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蔡扶民当然支持：“发挥你的写作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鼓与呼……”

此时的钮惟新可以说才思滚滚，他挖空心思写了一篇散文诗《公社照相馆》发表在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内容是写照相馆里一对男女青年的婚纱照，一个劳模胸戴大红花英雄照，一只肥头大耳的老母猪的功绩照，最后一句话是“公社照相馆，留下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画图”。走上街头，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向乡亲们朗诵他那洋溢着豪言壮语一般的光辉诗篇：“麦粒当作锣鼓敲，一枝麦秆作笛箫，卷个麦叶成圆号，齐奏人民公社好。”

有一天，他到睢宁县城的邮局取信，发现信封上一枚打着强烈时代烙印的邮票，如获至宝，这是一枚“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纪念邮票，精美漂亮，昭示这一年风调雨顺，农业取得好收成。然而从睢宁回凌城路上他却发现了问题，脚下田野广袤，一望无际，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却无人收割。——没有粮食，老百姓吃什么？

三

转眼是1959年。好像一夜之间凌城农中出现了让人担忧的现象——到学校来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少。他们为此焦虑。

“我们去家访，了解一下情况。”钮惟新提议。

于是两人分头行动。钮惟新去的是一个叫朱圩的村子，有个姓吕的初三小同学就在这个村，小同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作文写得很好，已有几天没到校了。走到他家，发现他无力地躺在炕上，头肿得像笆斗一般大，一看就知道是吃了野菜中毒

的症状。小同学见了钮惟新急忙爬下炕，深深地鞠了一躬，流着眼泪说：“老师，俺不能念书了，明天要和俺娘到南乡去要饭了……。”

小同学一一掀开面缸让钮惟新看，是啊，家里没粮吃怎么能上学？他问小同学：“你家的粮食呢？”

小同学说：“今年生产队分粮少，都吃光了。”

钮惟新掏出随身带的十几块钱给姓吕的小同学：“去买一点粮食回家，有饭吃了就到学校上学……”

“是。”小同学答应了。

当时阴霾遮天，钮惟新去找蔡扶民时，心像天空一样阴沉。——这个姓吕的小同学真的还能上学吗？

蔡扶民在徐洪河那边走访，情况相差无几。他去红旗大队学生李花荣家，他家的土屋内蓬蒿过膝，荒无人烟，只有一股潮湿阴暗的霉臭气味。当时李花荣不在，土屋内却传出病人的痛苦呻吟。蔡扶民与钮惟新走进来，发现李花荣的爷爷李乘鯉卧病在床，脸色蜡黄。老人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他还是一位民间画家，曾经做过不少大红大紫的年画，歌颂大跃进，歌颂人民公社，如今却饿倒在一间破旧的草屋棚里孤独无援。见到老师老人挣扎着想起身，但终于没有起来，只得用枯瘦的手臂支撑着身体勉强抬头说：“今年我家怕熬不过去了……”

蔡扶民打开锅盖，钮惟新摘下眼镜仔细看，一口破锅里清水煮胡萝卜，算子上蒸着榆树叶，根本不是人吃的饭食。

两人相对无言。他们一方面同情这些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另一面是对这种现实的无奈，他们为不能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而揪心。他们的供应粮仅能糊口，根本没有余力帮助他们，即使有点余粮，全班、全校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要多少粮食来补助？

当晚回凌城农中，尽管心情郁闷，但在当时那种虚妄的狂热中，没有向深处考虑，总觉得困难是暂时的，因此他们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的故事，鼓励学生咬紧牙关，坚持到校读书，他们认为：“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万民不屈的精神一定会迎来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然而豪言壮语并不能填饱学生们的肚皮，前来上学的学生继续减少。

睢宁县是夏禹时邳国所在地，历史上水路通衢，人丁兴旺，商贸繁荣，据说从未贫困过。这引起他们的思索。——这是怎么回事？哪里出了问题？不是说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吗？怎么没一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呢？

有一天中午放学，钮惟新发现初三学生王维君没回家，这个女生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人很腼腆。他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不回答，旁边女生说：“他们村的食堂断粮，她家里没饭吃了……”钮惟新拿出自己的饭票到农中食堂打饭给她吃。可到下午下班时，她饿昏在教室里。——原来给她打的饭她没舍得吃，准备拿回家给她几天汤水未进的母亲，自己饿昏了。

她那个村子怎么了？那个村跟朱圩村相隔很远，农民分粮也是很少吗？钮惟新送王维君回家终于了解了实情。原来这个村虚报产量厉害，收 80 斤，报 130 斤，大多给公社收取了。大队小队干部再私分一些，落到社员手里就没有多少了。——严重的浮夸风害人不浅啊！粮食部长沙千里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承认，1959 年全国粮食产量号称 5500 亿斤，而实际上只有 3400 亿斤。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的粮食达到 1348 亿斤，许多地方征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

不仅如此，公社干部作风问题很严重。

王维君同学的村里人说，社员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大

炼钢铁”的空隙打些野菜充饥，但公社干部不准，一旦发现就没收充公到集体食堂，社员被迫在夜间行动，偷着打些野菜拿回家煮着吃。公社干部为此采取了强有力措施，站在高坡放眼看，发现谁家房顶烟囱冒烟，他们便破门入室搜查，搜出谁家锅里煮野菜，便几脚把锅灶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谩骂与拳打脚踢，有时打得社员嗷嗷哭。

打骂之后并不算完，还要断粮扣饭，如果哪个公社干部一冲动多扣你几天，那你就会被活活饿死，所以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本来就剩下那点糠糙菜饭，如果再扣掉几天，哪能不死人？即使这样，求生欲望很强的社员为了得到一点点食物并不怕拳打脚踢，照样到田间挖野菜回家煮了吃。为此公社干部想出绝招，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中的锅碗瓢盆、锅灶等等，凡能煮食物的器具统统砸碎，严禁农民在家吃饭。社员唯一一条求生之路，也被公社干部堵死了。

钮惟新说：“那些公社干部怎么会这样对付老百姓？邻里乡亲的怎么突然变得这样无情？中央没这么说，毛主席也没这么说，那到底是怎么了？这问题要向上级反映！”

晚上从村里回到学校，钮惟新跟蔡扶民彻夜长谈。——是浮夸风害了农民？还是公社干部昏了头脑？他们探讨这个问题，并根据探讨的结果写了第一封信，向上级反映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当时想法很简单。”蔡扶民说，“就是为了保证生源，学生都饿得上不了学，我们教师在教室教谁？如果学生没有饭吃，我们又怎么安心给他们上课？所以我们就是反映公社浮夸风，反映干部作风问题，让学生和家长有饭吃，学生都来上课。”

“是啊。”钮惟新说，“当时只是汇报了睢宁县凌城公社附近农村饥荒、农民缺粮的实情，考虑的也只是一县一村的局部

问题。”钮惟新说。

尽管想法简单，但信函发送的规格很高。当时可以刻钢板，用油印机印刷，但他们没用，而是手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了四份，寄给中央主席毛泽东、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粮食部部长沙千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为了表示诚意，最后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信函发出后，他们坚信奇迹就会发生，毛主席这个大救星一旦知道了睢宁的实情，一定会阳光普照，派员过问，或者微服私访，解决问题。不久，吃饱穿暖的学生们会背着书包，满面红光地来上学了。

第二章 走进苏鲁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四

期待中迎来了 60 年代的第一天，天气依然寒冷，发出去的信函一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等待毫无结果，而悲情不断发生。

秋天迈着蹒跚的脚步来临了，农家的日子越来越困难。有一天，徐洪河对岸丁楼村有一个姓桂的学生出事了。那天丁楼村的学生突然跑来农中说：“不好了，小桂偷刨村里的山芋，被队长逮到生产队去了。”那时村村都有一个巡逻队，发现谁家冒烟就砸谁家锅，谁挖野菜自己吃就大会批，小会斗。如果是偷，那就罪上加罪，甚至可以草菅人命了。

“大事不好！”钮惟新叫了蔡扶民一起往村里跑去。跑到徐洪河，眼镜都掉了下来。到了丁楼村生产队办公室，只见屋梁上吊着一个少年，少年脖子上套着一个小箩筐，箩筐里装满山芋，拉得他脖子老长，浑身伤痕累累，看来是被打昏了。他们上前仔细打量少年那张小脸，正是姓桂的学生。钮惟新责问队长：“你们这是干什么？他是我们的学生，快把他放下来！”

队长说：“他是小偷，偷生产队的粮食……”

蔡扶民正色道：“小孩子饿了，刨点队里的山芋，这算什么偷，顶多教育几句，哪能吊人！你应该知道，吊人是要出人命的。”

队长不服：“你们是老师，难道不知道公社的政策吗？偷